

# 編後語

中國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在2012年末更迭完畢。正如以往一樣，這次領導人的更迭依然引發海內外中外文媒體的熱議。熱議的熱度之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治精英更替的低制度化程度。由此，中國政治未來的走向自然充滿了不確定性。更為重要的是，同很多國家政治變化的影響度有限有所不同，政治因素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影響之深之廣，依然在全球視界內都名列前茅。更何況，不確定性的影響範圍並不止於中國國土，而且還遠及世界各大洲。因此，從各種蛛絲馬跡來探究一下(談不上預測)中國未來政治的不確定性究竟會以哪些方式展示出來，自然成為各方論者熱衷的一項智力活動。

無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中，政治精英的行為毫無疑問都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當今國際社會科學中最为興旺的新制度主義，將行動者在既有制度中的互動視為各種社會變遷(包括公共政策的決策與執行、社會結構的轉變和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等)的最重要解釋因素。在新制度主義的視野中，各類行動者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互動的核心，但是利益的形成和表達則受到極為複雜的多重因素的制約。其中，理念因素甚至偶然因素，都有可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國政治精英的代際因素，或許並非無足輕重。更令人好奇的是，中國新一代政治精英還普遍經受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練。當然，具體到個人，他們在這一運動中異質化的經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時代背景究竟如何在他們的未來施政中留下烙印，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對此進行了探討。

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資深研究專家，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依據社會學中代際研究的分析框架釐清了中國新政治精英的代際構成和特徵，並由此論證了他們推動改革創新的有限性。在他看來，「與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利益所佔的巨大權重相比，代際因素的份量似乎很輕，輕到以至於想憑此實現突破非常困難。」充其量，「新的領導集體」只能帶來一些「新的領導風格」。在徐友漁筆下，「知青」經歷給新政治精英所帶來的最深思想衝擊就是理想信仰的崩塌和實用主義的盛行。他們的底層經歷並不一定造就推動中國轉型的任何共識，相反還會成為利益群體異質化的觸媒。丁東發現，新政治精英青年期的底層經歷與後來的從政經歷，造就了一種奇特的混搭型格局，既有鄉村語言和國際時尚的混搭，也有舊體制時代價值觀和全球化普世價值觀的混搭。中國在今後以怎樣的方式「向何方定型和發展」，真是「尚待繼續觀察」。

在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當中，有一種因素的重要性無疑是確定的，那就是國家主義。這是一種深植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傳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以不同的面貌張揚出來。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發了兩篇文章，展示了民國時期國家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勃動，並揭櫫了中國知識人對於民族復興過程中國家角色的永恆期待。